



为什么公民运动  
能够取得成功

非暴力抗争的战略逻辑

玛丽亚·斯蒂芬  
埃里卡·切诺韦思 著

# 为什么公民运动能够取得成功

## 非暴力抗争的战略逻辑（节选）

玛丽亚·斯蒂芬 埃里卡·切诺韦思 著

赵然诺 译



很多学者的著作里都隐含着一种假设——在处理政治冲突的多数手段中，暴力最有效率。政治学家也普遍认为，之所以暴力革命在反政府运动中盛行，是因为暴力手段比非暴力手段能够更有效的实现他们的目标。尽管存在诸多假设，从 2000 年到 2006 年，塞尔维亚（2000 年）、马达加斯加（2002）、格鲁吉亚（2003）、乌克兰（2004-2005）、黎巴嫩（2005）、尼泊尔（2006）等国家有组织的公民运动利用包括抵制、罢工、抗议、不合作等非暴力手段成功地挑战了强权，并最终达成政治和解。我们亟需对这些非暴力运动的成功进行系统化的研究——特别对那些同时爆发暴力和非暴力运动的国家尤其重要。

现有的研究解释了非暴力运动是一种有效的抵抗形式。但是很少有研究全面系统地将所有已知的暴力和非暴力运动进行分析和比对。本书系统地分析了从 1900 年到 2006 年所有重要的抵抗运动的数据，希望我们的研究能够发现暴力运动和非暴力运动在推翻政权有效性方面的战略差异。为了更好地理解这种结果产生的原因，我们也把我们的数据和历史上发生过的暴力运动和非暴力运动的案例做了比较。

我们发现 53% 的非暴力运动取得了成功，相比之下，只有 26% 的暴力运动达到了目的。这种结果的产生有两个原因。

第一，一个承诺使用非暴力手段的运动更容易获得国内和国际上的支持，使人们能够更广泛的参与到抗争中来，而且这种更广泛地参与会给统治政权施加压力。同时，对进行非暴力抗争团体的同情也会转变成对于这些团体及其联盟更强大的内在和外在的支持，从而削弱统治当局的政治、经济，甚至军事权威。

第二，政府对暴力运动的武装镇压很容易合理化，但对非暴力运动的武装镇压常常会引来更多的抗议支持者。潜在的持同情态度的公众会把暴力运动的组织者视为从不妥协的极端派，而非暴力运动的组织者则更温和，更容易得到公众的支持，他们在谈判中也更容易达成共识。

我们的研究挑战了传统的，认为暴力是成功反抗极权最好方式的假说。我们坚信，非暴力运动也可以有强大的力量战胜政治强权，不论这一强权来自民主还是非民主国家。非暴力运动甚至比暴力运动表现得更出色。

本书将按照如下方式展开：第一部分展示我们的论点；第二部分介绍我们数据的取得和我们基于经验的初步推论；第三部分分析评估三个东南亚的暴力运动和非暴力运动；第四部分根据我们的研究，给活动家们提出一些理论、政策方面的建议。

## **第一部分 为什么公民运动能够取得成功——非暴力抗争的战略逻辑**

非暴力抗争是一种以公民为基础，不使用或者不威胁使用暴力手段，而是通过社会、心理、经济和政治手段进行斗争的方法。这种斗争方法既包括故意不完成政府交给的工作，又包括故意违反政府的法律和政策，也可能是两者相结合。

学者们概括了几百种非暴力抗争的手段——其中包括标志抗议，经济抵制，罢工，政治和社会的不合作，非暴力干预——运动团队运用这些手段，支持或者反对政府的各种政策，以削弱对手的供给，或者切断、限制对手的权力资源。非暴力抗争不在传统的政治框架内运作。这使它迥异于其它的非暴力政治手段，比如游说，选举或者立法等。

战略性非暴力运动与传统的非暴力运动的不同在于，后者通常是由于宗教或者道德方面的信仰而反对使用暴力。虽然有些人是因为有这样的信仰而加入到非暴力运动之中（比如甘地和马丁·路德·金），但是大多数参与非暴力运动的人并不具有这种反暴力的信仰。如果分不清楚反暴力信仰、和平主义、消极主义、软弱或者个体的街头抗议者，就不能理解这一现象。

人们往往称非暴力运动为“和平”运动，但是“和平”这一称号实际上掩盖了有组织的非暴力运动会对统治者造成高度干扰的本质。非暴力运动的组织者通过大规模不合作和挑衅夺取斗争的主动权，并最终摧垮对手的意志，实现自己的目标。

人们时常认为，暴力运动对统治者最具有压力，或者最容易强迫对手和解，从而达成运动想要的政治变革。比如，有人会认为恐怖主义是一种最有效的战略，特别是在强迫民主国家做出领土让步的时候表现卓越。但是，美国的政治学学者麦克斯·亚伯拉罕的研究表明，通过恐怖主义达到政治目标的成功率只有7%。尽管如此，亚伯拉罕仍然得出结论，认为那些恐惧分子之所以选择恐怖主义，是因为恐怖主义比非暴力运动更有成效。

我们认为有以下两个原因导致非暴力运动在战略上优于暴力运动：

第一，统治者用暴力镇压非暴力运动反而有可能危及政治。1、可能强化抵抗组织内部的团结，使反对派联合起来；2、可能瓦解政权的支持者，使他们对统治政权产生不满甚至互相冲突。特别是当非暴力运动不以暴力对统治政权的镇压进行还击，而且这一情形舆论广泛传播时，统治政权的支持者会显著减少，民众甚至会主动参与到非暴力运动中来，使双方的力量对比发生逆转；3、在政权内部——公务员，国家保卫机关和司法机关，在使用暴力对非暴力运动进行镇压的时候会考虑个人或者政治上的负面效果，而他们在镇压暴力运动的时候则很少有这种顾虑；4、国际社会更愿意对非暴力运动提供支持，对于统治政权用暴力镇压非暴力运动的谴责与制裁也远远高于对“恐怖主义”或者“暴力起义”镇压的反应，这使得统治者付出的外部成本将非常之高。尽管有些外国政府会援助实施暴力镇压的政权，有些外国政府也会给武装起义者提供物质支持以对抗他们的对手。但这种情况为数不多，而这些外国政府支持的暴力斗争，最终达到其变革目标的为数更少。

第二，非暴力运动往往更愿意进行沟通和谈判。政权内部成员和支持者在了解到社会变革后他们的生命不会受到威胁时，也更容易进行谈判。

反馈推断理论——一种对人们如何在不同环境下选择自己行为模式的心理学理论——认为非暴力运动更容易吸引民众，也更容易策反统治政权的支持者。这一理论认为，人们会根据对手的行为来决定自己如何做出回应。这种倾向从两个方面使非暴力运动受益。

第一，民众的支持对任何抵抗组织都至关重要，而公众往往认为，非暴力运动不会对他们的生命造成威胁，对社会造成的破坏也小得多，而暴力运动则相反；民众不愿意支持与统治者同样暴力的组织和无视民众伤亡的暴力抵抗者；非暴力运动更愿意接受谈判。

第二，当暴力运动威胁到政权内部成员（警察、军人、公务员）生命安全的时候，这些人变节的概率会大大降低。亚伯拉罕的研究发现，如果恐怖分子针对平民发动恐怖袭击，会比那些只针对警察和军事目标发动袭击的同行失去更多民心。这些人投向暴力组织可能带来巨大的风险，因为暴力组织很可能会杀掉或者对他们进行肉体和精神上的折磨，同时他们还会受到来自统治者的惩罚。而非暴力抵抗组织不会直接威胁他们的身体安全，所以这些人更愿意向非暴力运动投诚。当政权内部成员不再服从统治者，或者不再与政府长期合作，政府对政权的控制就会松动。

当然，统治政权对暴力运动的镇压也可能适得其反。例如英国军队对北爱尔兰共和军的严厉镇压反而给共和军带来了大量的支持者。但是，我们认为这种情况更可能发生在对非暴力运动镇压之后。尽管镇压会造成短暂的低潮，但与暴力运动相比，非暴力运动更可能从政府的镇压中获得长期利益。长期、持续的镇压所消耗的内在和外在本成本可能会迫使政府向非暴力运动妥协，暴力运动却很难做到这一点。下一章我们将检验这一假说。

## 第二部分 检验我们的假说

罗纳德·弗朗西斯科和其他一些社会学家发现，统治者的镇压会给抵抗运动带来更多的支持者。也有一些学者发现，民众对政府镇压的容忍程度取决于抵抗运动是暴力的还是非暴力的。假说 1 反映了这种变化。

假说 1：统治政权使用武力镇压会增加非暴力运动的成功率，降低暴力运动的成功率；

军人和警察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如果他们开始不服从命令，意味着统治政权已经失去了最重要的权力支柱。非暴力运动容易使军人和警察不服从命令，暴力革命则更容易让军人和警察一致对外。假说 2 说明了这种预测。

假说 2：非暴力运动在使军人和警察变节方面比暴力革命更有优势；

遭到统治政权镇压的非暴力运动不仅容易获得国内民众的同情和支持，也更容易赢得国际社会的支持和援助。通常认为，国际社会对专制政权进行制裁会给非暴力运动带来帮助。假说 3 预测了这种帮助。

假说 3：与暴力运动相比，非暴力运动从国际援助和跨国支持中获益更多；

国际社会通常反对暴力运动，因为暴力运动往往通过不合法的政变带来政权更替。当然，专制政权也可能受到其外国盟友的援助，以镇压非暴力抵抗运动。这种援助因为增加了统治政权的权力资源，通常会降低抵抗运动（无论是非暴力的，还是暴力的）的成功率。假说 4 总结了这一因素。

假说 4：外国盟友对于统治政权的支持对暴力革命和非暴力革命都会造成损害。

## 研究设计与方法论

我们的研究有三个目标：第一，弄清楚暴力运动和非暴力运动在取得他们既定目标的时候哪一个取得了更好的成绩；第二，探索有哪些变量影响了抵抗运动的结果；第三，了解是什么结构性因素导致非暴力运动的成败。为了实现这些目标，我们建立了抵抗运动结果数据库（NAVCO），它包含了从1900到2006年的323个暴力与非暴力抵抗运动的案例。

在本书中，抵抗运动的定义是：为了取得某个政治目标的胜利而进行的一系列可视的、持续的战术应用，有自己的名称和领导者。无论持续几天还是几十年，通常有一个明显的开始和结束，有一些明确的事件贯穿它的历史之中。——这些特征使抵抗运动区别于普通骚乱或者群体性事件。我们的数据库选取的运动和它们开始结束的日期，是基于多种来源的资料对其评价达成的共识。

但要把一场抵抗运动定义为“暴力”或者“非暴力”则非常困难。在很多案例中，不同的抵抗团体有时会同时进行暴力和非暴力运动。有些团体在他们进行运动的过程中既使用暴力手段又使用非暴力手段，比如南非的非洲人国民大会。描述一场运动是暴力还是非暴力，只是把它的一系列抵抗路线进行简单汇总。为了解决这一定义上的困难，我们给这些概念订立了更具体的标准。

最初的非暴力运动名单是从一个广泛的非暴力斗争和社会运动的文献中总结的。然后我们利用不同渠道汇总这些数据。我们使用的渠道包括百科全书、案例分析，艾普瑞·卡特、霍华德·克拉克、米歇尔·兰德编著的一系列非暴力公民运动目录。最后，这些案例被发送给非暴力运动的专家传阅。我们请专家评价这些案例是否属于主要的非暴力运动，以及是否有另一些主要的非暴力运动被忽略了。如果有专家提出了新的案例，这个新案例也会走相同的程序。这一结论性的数据将那些主要使用，或者完全使用非暴力手段的运动定义为非暴力运动。那些表现出明显的暴力特征的运动被定义为暴力运动。我们对于暴力运动的数据既有来自克里斯蒂安·克劳蒂斯2004年增补世界各国内战资料后的《战争相关数据库》（COW），又有来自卡列夫·谢普2002年以后建立的《反暴力叛军行动数据库》。

我们需要对运动达到顶点的年份进行分析。在很多案例中，一场运动只存在一年，其顶点年份非常容易区分。对另一些持续数年的运动，则根据以下两个标准之一决定其顶点年份：1、参与运动人数最多的那一年；2、如果参与运动的人数信息缺失，那么该运动被镇压、解散或者成功的那一年就是顶点年份。

我们将这些运动的成果划分为成功、有限成功、失败。成功的运动必须具备两个条件：1、运动的目标在一个合理的时间范围内实现（比如2年内）；2、运动必须有一个可以被识别的成绩。有限成功的运动要使统治政权有明显的让步（比如有限自治、本地权力共享、独裁国家更换了新的领导人），但是运动的目标没有全部实现（比如领土独立或者通过自由公平的选举达到政权更迭）。失败的运动意味着没有达到目标或者没有取得当局明显的让步。

为了检验第二部分的4个假说，我们依照不同的独立变量收集数据。第一个变量：统治政权是否会使用暴力进行镇压。我们认为统治政权对非暴力运动进行镇压会激怒国际社会和国内民众。因此，镇压会增加非暴力运动成功的概率，而降低暴力运动成功的概率。

第二个变量：军队和警察部队是否会变节。这不包括一般的、少量的个体变节，而是指大量的、系统的统治秩序执行能力的大崩溃。相比人民代表或行政官僚的变节，我们认为军队和警察部队变节是一个体现对该政权忠诚变化的最严格的标准。类似的情形（包括变节）通常会在运动结束时发生，我们希望这些情形的发生会对运动成功产生正面的作用。

第三个变量：外国对于抵抗运动的支持程度。对于抵抗运动的支持可以分为外国政府对运动的援助和国际社会对统治者的制裁。因此这个变量包含了外国政府对于某个运动的直接援助（军事、经济方面的），或外国政府因为该国统治政权针对抵抗运动的某种行为而专门进行的制裁。另外，我们还设定了一个变量以表明统治政权是否从外国政府接受明显的军事物资以镇压抵抗运动。

最后，我们引入了几个控制变量：第一，“民主程度”。一些学者认为，民主政权对异议有更高的容忍能力，而且民众更容易对政府施加压力。因此，不论是暴力还是非暴力运动都应该在对抗民主政权方面更有效。为了评估这些影响，我们使用目标在《政体四》上面的民主倾向来考察起在运动结束前一年中的表现。第二，“持续时间”。我们控制抵抗运动的持续时间（以天计算），因为时间可能影响运动的结果。第三，“冷战还是后冷战”。包括冷战和后冷战时代的傀儡政权，冷战时代的傀儡政权指 1949-1991 年期间，后冷战时代的傀儡政权指 1992-2006 年期间。

## 经验主义结论

为了评估每一个独立变量对运动成功产生的作用，我们引入了多项逻辑回归模型（MLR），这一数学模型让我们比较不同的独立变量对于未来事件的结果（成功、有限成功、失败）发生概率的影响。前面提到的假设可以推论出抵抗运动的类型，统治政权对运动的暴力镇压，国际制裁，外国政府对于运动的援助，以及外国政府对于统治政权的援助等变量对运动成功可能产生的影响。

表格 1 解释了运动受到统治政权镇压时，不同条件对抵抗运动成果的影响。表格 1 显示了很多有趣的现象。第一，在同样面对统治政权镇压的时候，非暴力运动成功的概率比暴力运动高 6 倍。统治政权向非暴力运动做出让步的概率比暴力运动高 12 倍。这些发现支持了假说 1；第二，军队和警察的变节使运动成功的概率提升了 4 倍，这一发现支持了假说 2；第三，虽然外国政府支持可以使运动成功的概率提升 3 倍，但国际制裁却没有类似的效果。这一发现只能部分支持假说 3；因为外国政府对统治政权的支持微乎其微，所以没有相关证据支持假说 4。

正如我们预期的，统治政体越民主，运动成功的概率越高，但运动持续时间的长短对于是否获得全面成功没有影响；运动时间的延长可以增加取得部分成功的可能性；冷战后运动成功的概率高于冷战前——这很可能因为运动的组织者提高了学习的能力。

为了进一步检验假说 2，我们使用了逻辑回归模型去评估非暴力运动对提升军队和警察系统变节概率方面的作用。表格 2 表明非暴力运动对于军队和警察系统的变节没有明显影响，这背离了我们的预期。这一对军队和警察系统忠诚度的严格评估不包括其它社会成份（比如公

民社会或者官僚系统)的忠诚度。这些社会成份的忠诚度很可能在军队和警察系统仍然忠实于政府的条件下发生变化,就像1989年东欧剧变中的情形那样。但数据表明,32%成功的暴力运动与变节有关,52%成功的非暴力运动与变节有关。

最后,为了决定到底哪一个变量是一场运动最重要的成功因素,我们将对暴力运动和非暴力运动分别进行讨论。表格3显示:第一,假说1有力的证明了统治政权的暴力镇压对于运动的成果没有任何实际效果。不管这场运动是暴力的还是非暴力的,统治政权的暴力镇压既不会增加也不会减少运动成功的概率。但表格1显示,在面对镇压的时候,非暴力运动比暴力运动更容易成功。第二,假说2证实,如果军队和警察系统变节,非暴力运动的成功率将提升46倍!相比之下,暴力运动的成功率却几乎没有提升。第三,假说3没有得到支持。非暴力运动是否得到外国政府的援助对其成功概率的影响基本为零。但是暴力运动如果得到外国政府的支持,其成功概率将提升3倍。我们发现国际制裁也有着相似的影响:对于非暴力运动的成功概率改变很小,但是可以使暴力运动的成功概率加倍。第四,假说4也没有得到支持。外国政府对于统治政权的直接支持不会对暴力运动或者非暴力运动的成功概率产生不利影响。这可能是因为非暴力运动的活动家可以通过动员本国民众的支持来降低外国政府援助的影响。与此相反,如果非暴力运动直接接受外国政府的援助,可能会使其运动丧失合法性。很多国家的活动家都因为过分依赖外国政府的援助而失去了本国民众的支持。另一个可能的解释是,国际制裁会减少非暴力运动活动家可用的资源(包括数量众多的本国民众),迫使他们不得不寻找补偿的战术方案。暴力运动则很少受到国际制裁的影响,因为武装分子可以从他们控制的地区强行获取资源。而且暴力运动不像非暴力运动那样依赖广大民众的积极参与。因此,在外国援助可能丧失运动合法性的问题上,非暴力运动的活动家比暴力运动的活动家受到的影响更大。由于外国政府的援助在数据上的作用如此微不足道,它的实际效果可能还不如NGO、媒体的支持,以及外交压力有效。

对于控制变量的分析还显示了一些有趣的结论。第一,不同的统治政体对运动成果有不同的影响。统治政权的民主程度每增加1分,非暴力运动的成功率就会增加23个百分点,而暴力运动会增加7个百分点。这一发现和一些分析内战成本的文献得出的结论一致,这些文献认为,民主政权对于民众的诉求更敏感。第二,运动持续的时间,取得全面成功的概率越低,对于非暴力运动尤其如此。暴力运动持续的时间越长,取得部分成功的概率越大,但不会增加暴力运动全面成功的概率。第三,冷战期间的非暴力运动的成功率要低于冷战前和冷战后,但冷战期间和冷战后的暴力运动成功率要高于冷战前。

总之,非暴力运动在面对镇压的时候更容易取得胜利。国内压力(比如大规模变节)对非暴力运动更有利,而国际压力(制裁或者外国政府的援助)对暴力运动更有利。变节这个变量对于任何运动的成功都有积极影响。尽管军队和警察系统的变节对非暴力运动和暴力运动的成功影响差别巨大,但是我们还不能确定当民众广泛变节的时候,非暴力运动和暴力运动是否也存在这样大的差异。我们的变量基本上可以研究抵抗运动在面对镇压、变节和外部援助时的表现。但目前这些数据还受制于我们的研究设计,该设计不能建立明确的因果关系,因为样本的时间跨度还不够长。我们将进一步在研究中探索这些问题。

	成功	部分成功
使用非暴力手段	6.39***	11.78**
军队和警察系统变节	4.44	1.05



外国政府对统治政权的支持	-0.80	1.10
对统治政权的国际制裁	1.32	-0.60
国际社会对运动公开支持	3.36**	1.76
统治政权的政体	1.07**	1.01
运动持续时间（有记录的）	-1.00	1.47**
冷战	2.97**	1.25
冷战后	6.10***	7.88**
全体	234	234
卡方分布 ( $\chi^2$ 或者 $chi^2$ )	56.62	56.62
Prob>chi <sup>2</sup>	0.00	0.00
误差 R <sup>2</sup>	0.17	0.17
注意：列举 RRR 相关风险系数是为了便于解释系数与运动失败相关。显著性等级：***p<0.01；**p<0.05；*p<0.10。Hausman 和 Small-Hsiao 可以用来检验系统健壮性（计算机术语）。		

使用非暴力手段	0.41 (0.28)
统治政权的政体	-0.00 (0.02)
外国政府对于统治政权的支持	-0.00 (0.31)
对于统治政权的国际制裁	0.66 (0.42)
冷战	0.30 (0.35)
冷战后	-0.19 (0.48)
持续性	-1.48*** (0.29)
全体	267
卡方分布	6.86
Prob>chi <sup>2</sup>	0.3343
误差 R <sup>2</sup>	0.03
显著性等级：***p<0.01；**p<0.05；*p<0.10。括号内数字代表稳健标准差。	

	非暴力运动		暴力运动	
	成功	部分成功	成功	部分成功
统治政权的暴力镇压	-0.39	-0.9	-0.71	-0.5

军队和警察系统 变节	46.51***	2.63	2.1	1.34
国际社会对于统 治政权的支持	1.31	1.86	-0.99	-0.86
国际社会对于运 动的支持	-0.19	-0.10	2.81*	1.53
对于统治政权的 国际制裁	-0.31	-0.43	2.56	-0.39
统治政权的政体	1.23**	1.17	1.07**	-0.97
运动持续时间 (有记录的)	-0.51*	-0.70	1.07	2.03**
冷战	-0.03**	-0.02**	2.91**	1.19
冷战后	-0.16	0.13	4.09*	8.05**
全体	94	94	173	173
卡方分布	45.88	45.88	39.55	39.55
Prob>chi <sup>2</sup>	0.0003	0.0003	0.0024	0.0024
误差 R <sup>2</sup>	0.27	0.27	0.12	0.12
注意: RRR(相关风险系数)系数解释了演绎;系数与运动失败相关。显著性等级: ***p<0.01; **p<0.05; *p<0.10。Hausman 和 Small-Hsiao 检验可以用来检验系统健壮性				

## 案例分析

为了建立抵抗组织类型和其有效性之间的关系，我们检验了3个案例。它们发生在菲律宾，缅甸和东帝汶，而且均使用了暴力和非暴力手段。我们选取这3个案例有如下原因：第一，菲律宾和缅甸的案例是反对本国政府的，而东帝汶的案例是反对外国占领的。这样可以尽可能涵盖运动目标的多样性。第二，这些案例中的非暴力运动有成功也有失败。第三，这些案例的选取受最接近案例分析设计的影响。根据这一设计，每个案例都可以和同时期相同的统治政权的回应进行比较。更重要的是，这些案例中的运动都没有接受外国政府的援助，这使我们不必讨论“外国政府的物质援助”这个因素对运动变化的影响。

这一比较方法有多重目的。第一，可以为理论检验提供严格的案例筛选方案，以避免受到样本选取有所偏向的指责。因为我们的样本既包含了期望（运动成功）又包含了偏离（运动失败）的结果。第二，这一研究方案可以改进理论模型。因为对于失败的运动需要做出更进一步的解释。巢式方差分析(译者：一处抽样调查方法)既包含了期望的结果（非暴力运动成功）——菲律宾和东帝汶的案例，又包含了偏差的结果（非暴力运动失败）——缅甸的案例。对于偏差案例（失败）的分析进一步说明数据库需要更多的变量敏感度，以及是否有其它被遗漏的因素来解释这一成果的差异。

### 东帝汶，1988-1999

30年前，印尼入侵了东帝汶这个坐落于印度尼西亚群岛的半岛国家，1975年东帝汶成为印尼的一个省。这个盛产锡和离岸天然气的前葡萄牙殖民地在印尼总统苏哈托1975年11月对

其大规模空袭和地面入侵之前，刚刚摆脱葡萄牙的殖民统治。苏哈托入侵东帝汶的理由是东帝汶左翼民族主义团体——东帝汶独立革命阵线（简称革命阵线）在一个月前宣布东帝汶独立。革命阵线是一个共产主义团体，它的独立威胁了东南亚的和平与稳定。印尼知识界挑起了帝汶人之间的矛盾，并且支持不同的帝汶派别之间进行内战。帝汶民主联盟和帝汶人民民主委员会与印尼政府签署了《巴里布宣言》协议，同意东帝汶并入印尼，以此来反对他们的政治对手——东帝汶独立革命阵线。《巴里布宣言》成为苏哈托政权入侵东帝汶的借口。印尼的入侵造成接近三分之一帝汶人死亡。

尽管联合国安理会谴责了印尼对东帝汶的入侵，但由于没有采取强制措施，使联合国的谴责成为一纸空文。同时，印尼在帝汶首都帝力成立了由印尼军队和东帝汶各反革命阵线派别组成的傀儡政府。政府用经济优惠政策吸引超过 10 万印尼穆斯林移民到信仰天主教的东帝汶。这个小岛被印尼占领后，所有国际媒体对东帝汶局势的报道都被国家严格管制。

早期抵抗组织主要是独立革命阵线武斗派——东帝汶国家解放武装力量（简称国解武力）。国解武力依靠葡萄牙军队遗留下来的武装，在东帝汶的山区丛林展开广泛的武装斗争。尽管早期有所成就，但 1980 年印尼的反扫荡战争无情地摧毁了武装抵抗，并且杀死了将近三分之一的东帝汶人。东帝汶抵抗组织不得不进行大规模的战略转变。

这次转变的领导人凯伊·夏纳纳·古斯芒是国解武力幸存的指挥官。他徒步走遍全岛，和不同的抵抗小组会面，调查支持抵抗运动的潜在人数。一个备受尊敬的天主教大主教说服了古斯芒放弃马克思-共产主义倾向，以取得教会和西方政府的支持。古斯芒放弃了国解武力的领导权，成立了新的无党派抵抗阵线——东帝汶抵抗全国委员会（简称帝国委）。帝国委由 3 个主要力量组成：武装阵线，民主阵线和秘密阵线。这个新的抵抗组织之所以强调无党派，目的在于尽可能包容各方面力量。

秘密阵线原来是国解武力的分支，20 世纪 70 年代成立的学生组织。该组织从 1988 年开始在东帝汶、印尼和其它一些国家的首都领导了一系列非暴力运动。由于大量的东帝汶年轻人在印尼读书，因此该组织在印尼和东帝汶的支部发展了一个大型的去中心化的运动团体。他们通过教育和非暴力运动提升公众对东帝汶局势的认识。秘密阵线最初成立的目的是作为武装斗争的辅助网络，但最终角色转换，变成了支持独立抵抗运动的主要力量。

1988 年 11 月，秘密阵线发起了第一次大型抗议活动。当时正值教皇约翰保罗二世受苏哈托总统的邀请访问帝力。教皇此行的本意是要授予印尼的占领更多的合法性。在数千人参加的教皇弥撒典礼上，一群东帝汶青年爬上圣坛高呼支持独立的口号，并展开多幅要求印尼撤军的旗帜。经过媒体报道，这次抗议活动羞辱了印尼政府，让外部世界看到了东帝汶事件的另一面，同时降低了东帝汶人对印尼政权的恐惧，更多的非暴力抗议开始了。其中包括 1990 年美国大使访问帝力时的戏剧性抗议和偷偷把澳大利亚记者带进东帝汶丛林采访古斯芒。

东帝汶独立运动最重要的转折点是 1991 年 11 月 12 号，这一天，印尼军队向东帝汶参加和平葬礼游行的人群开火，造成超过 200 人死亡。一个英国制片人用拍下了这场大屠杀，在现场的西方记者提供了目击证词和照片。这场大屠杀很快传遍了全世界，引起了国际社会的愤怒，促使东帝汶人重新审视自己的抵抗战略。一位东帝汶领导人说：“在帝力大屠杀后，我们达成了共识：东帝汶人和印度尼西亚人有一个共同的敌人——印尼军队和苏哈托独裁政权。我们必须把印尼人拉入我们的阵营，因为这不仅是我们的斗争，也是他们的斗争。”

1996年的诺贝尔和平奖颁给了东帝汶天主教大主教贝洛，以及东帝汶抵抗全国委员会的外交发言人若泽·拉莫斯·奥尔塔。用来表彰他们在和平结束印尼占领期间的功绩。在颁奖典礼上，贝洛和奥尔塔呼吁国际社会支持东帝汶未来的全民公投。

1998年一次大规模的非暴力抗争之后，苏哈托被迫下台。印尼的新领导人 B.J.哈比比很快出台了一系列旨在重塑印尼稳定和国际形象的政治经济改革。国际社会对哈比比处理东帝汶问题形成了巨大的压力。东帝汶已经成为印尼的外交丑闻和经济累赘。1998年6月，哈比比提出，只要东帝汶承认印尼对其拥有主权，可以赋予东帝汶特殊自治地位。但是哈比比的提案引来了铺天盖地的抗议和新一波潮水般的国际压力，他只好宣布，如果东帝汶人反对自治，独立也是可以选择的方案。1999年5月5日，印尼、葡萄牙和联合国签署了三方协议，同意在联合国监察下，东帝汶举行全民公投，以决定东帝汶的最终地位。

在全民公投中，80%的东帝汶人选择了独立。随后民兵在印尼的支持下制造了纵火事件，引起了大规模的动乱。在大选后的暴力动乱时期，古斯芒严令国解武力的游击队留在军营里，不要抵抗军方。古斯芒在解释他的决定时称：“我们不要中计，不要掉进他们暴力和内战的陷阱中去……我们不要一个由流血屠杀带来的独立。”

2000年9月4日，联合国安理会匿名表决支持了一致由澳大利亚领衔的国际武装到东帝汶维护和平。一个月后，驻东帝汶联合国过渡委员会成立。经过2年的过渡期，2002年5月，东帝汶成为了世界上最新的独立国家。

## 东帝汶：国际因素

在帝力大屠杀之后，支持独立运动的组织发起了“印尼化”和“国际化”的双重战略。印尼化战略目标是把斗争的中心推进到对手的腹地，和印尼知识学界，政治反对派和人权活动家联合起来。因此，东帝汶的活动家学习印尼语，使用印尼的法律体系，在印尼的学校上学，引用印尼的意识形态，接受印尼 NGO 援助，在印尼的街道上举行抗议活动。为了促进与印尼和国际活动家的合作，东帝汶的活动家成立了很多新的组织。他们在对暴力手段的价值进行激烈的讨论后，最终决定放弃暴力。

国际化战略以多边机构和支持苏哈托政权的外国政府为目标。为推进这一战略，东帝汶的活动家采取的最具戏剧性的非暴力战术是“跳墙”。这一活动包括跳过西方国家驻印尼首都雅加达大使馆的高墙，在墙内发起静坐，借此传递东帝汶人权被侵犯的真相。1994年，亚太经合组织雅加达峰会期间，超过29个印尼和东帝汶示威者进入美国大使馆，并且成功据守在里面超过12天。这一卓越的行动吸引了媒体的关注，羞辱了印尼政府。

支援东帝汶独立的非暴力行动需要一个跨国角色。在美国，东帝汶行动网络在帝力大屠杀之后成立。这一行动网络由人权组织、宗教小组和其它草根组织组成。他们成功地迫使美国政府承诺，除非印尼结束他们对东帝汶的人权侵害并允许其独立，否则将停止对印尼的军事援助。尽管雅加达的盟友四处游说进行阻止，美国国会还是在1992年出台了新的军事方案，把印尼剔除出国际军事教育训练计划的资金支持名单，禁止向印尼出口 F-5 战斗机。1994年美国国会还通过法律禁止向印尼出口小型武器。虽然后来克林顿政府继续向印尼出口武器

（甚至一度重新邀请印尼参加国际军事教育训练计划），但持续的压力使东帝汶问题成为了美印关系无法回避的核心议题。

尽管印尼政府在东帝汶进行大屠杀，制造了数不清的人权侵权案件，但坚持暴力斗争的国解武力并没有赢得国际社会的支持。而非暴力抵抗运动却从国际社会获得了足够多的同情，并促使国际社会对印尼政府实施制裁。

## 东帝汶：国内因素

东帝汶的暴力运动引起了印尼军队和警察系统的高度警觉和仇恨，他们认为无休止的游击战是因为东帝汶百姓掩护游击队，这导致印尼军队对平民和武装力量无差别的残酷镇压和扫荡。虽然占领军的残酷镇压提升了人民对游击队的支持，但游击队最多的时候也只有 1500 个战士。而且游击队报复性的反扫荡行动使冲突进一步升级。已经解密的军事文件显示，印尼占领军对己方在这场战争中最终取得胜利持明显乐观态度。

另一方面，非暴力运动却导致印尼国内民众的忠诚发生了动摇。首先印尼学生引发了大规模的反对占领抗议行动，然后受经济危机影响的商界精英也不再支持政府。在与日俱增的国际压力下，印尼军队内部也开始分裂。保守并享有特权的老军官和希望改革的少壮派军官发生观念上的冲突。后者认为印尼赢得东帝汶人全面的、由衷支持的企图已经彻底失败。

独立运动的领导层还拒绝了“自由亚齐运动”提供的援助，因为“自由亚齐运动”企图从印尼统治下获得独立，但采用的是暴力手段。在苏哈托政府民意支持直线下滑期间，印尼军队领导层呼吁总统下台。

在贝洛和奥尔塔 1996 年获得诺贝尔奖之后不久，曾经敌对的几个东帝汶组织在一个新的支持独立的东帝汶全国抵抗委员会的名义下成立了联合阵线，以应对印尼政府和国际社会。

1997 年亚洲经济危机为印尼大规模的社会运动创造了条件。东帝汶独立运动活动家和印尼反对派活动家一起走上街头，要求结束腐朽的苏哈托军事独裁。1998 年 5 月，苏哈托总统被迫下台。

在东帝汶，暴力革命最多只能凝聚 1500 人，而非暴力运动却凝聚了各行各业跨领域、跨阶层的数万名支持者。最终非暴力反占领运动产生的国内外压力迫使印尼政府在联合国监督下从东帝汶撤军。

## 菲律宾，1986

1986 年，为了推翻独裁者费迪南德·马科斯，菲律宾发起了人民力量运动。在此之前，有学者曾经预测，马科斯政府有可能被共产党暴力颠覆，也有可能被军队政变推翻。但即使政府腐败，经济混乱，肆无忌惮的暴力镇压导致马科斯政权的合法性受到质疑，这两种结果却都没有发生。而一个由政治家、工人、学生、商人、天主教领袖和其他参与者组成的反对派大联盟，却成功地迫使该政府下台。

菲律宾独裁者马科斯通过中央集权、国家垄断、卖官鬻爵、美国援助和国际金融机构贷款聚集了大量的财富。1969年他再次当选总统后颁布了《戒严令》，宣布要解决南部由共产党渗透和穆斯林分裂分子带来的威胁。马科斯指责政治反对派和共产党勾结，因此剥夺了他们的财产，逮捕了为数众多的政治犯。政治反对党四分五裂，主要反对派领袖或者被禁声，或者被马科斯的人替换掉。

菲律宾共产党 (CCP) 和它的新人民军游击队 (NPA) 从 70 年代末开始稳定地增长着力量，秉承马列毛的意识形态，并主导着整个抵抗运动。政府军队及其支持的民兵武装对各地的新人民军游击队围追堵截，但新人民军游击队越战越强，遍布国家的每一个角落。

70 年代末，为了应付美国政府，马科斯同意适度改革，其中包括 1978 年的议会选举。菲律宾最激进的反对派和政治流亡者小阿基诺再次竞选参议员。不过他的最终当选并没有使反对派阵营更加强大。一些参选失败的反对党成员随后参加了新人民军游击队，因参与纵火、爆炸事件遭到逮捕，而且被美国列入恐怖分子的黑名单。

1980 年被流放到美国的阿基诺一直和菲律宾国内的反对派保持联系，同时游说美国政府撤回对马科斯的支持。1983 年，因菲律宾经济危机，越演越烈的共产党暴动，政府军和民兵借镇压之名对人权的大规模侵犯，文官和武官司都想篡权等不混乱的局势下，阿基诺决定回到菲律宾。尽管之前得到马科斯保证其安全的承诺，但阿基诺在马尼拉国际机场刚走下飞机，即被军警随从人员刺杀身亡。阿基诺暗杀事件成为国际事件，并在菲律宾国内引发了多起反对马科斯政权的抗议行动。

阿基诺被暗杀之后，马科斯想通过 1984 年的选举重新分化反对派。但是很多中间党派加入了共产党领导的抵抗运动，其他人在阿基诺遗孀阿基诺夫人的领导下，排除政府暴力、大规模选举舞弊和媒体限制等困难，赢得了三分之一的竞争席位。

1985 年底，马科斯终止了总统选举，并宣布 1986 年 2 月重新选举。他自信可以在重选中获胜或者成功操纵选举。但要求改革的反对派聚集在国家民主主义反对派大同盟 (UNIDO) 的旗帜下，推举阿基诺夫人为总统候选人。阿基诺发起了人民力量运动，严令非暴力纪律，明确表示暴力行动是不可容忍的。宗教领袖也表达了对坚持非暴力原则的支持。

尽管马科斯控制了媒体，但隶属于教会，名为“真相”的广播和报纸报道了国家民主主义反对派大同盟选举的全过程。大主教詹姆·辛签署了牧师信，呼吁所有教徒为诚实并尊重人权的候选人投票。菲律宾天主教大主教会议也呼吁所有教徒使用非暴力手段抵抗选举舞弊。自由选举国家运动训练了 50 万个志愿者监督选举。

马科斯不顾选举监督员的计票结果，宣布自己在 1986 年的大选中胜出。阿基诺夫人率领 200 万菲律宾人上街游行，宣布是她自己和菲律宾人民赢得了大选。在马科斯宣誓就职一天之后，人民力量运动发动了民众广泛参与的大罢工，对国有媒体的全面抵制，对裙带关系控制下的银行大挤兑等一系列非暴力活动。

当几百万美国人在电视上看到数十万菲律宾人（包括天主教修女）趴在坦克前面这一画面的时候，美国政府完全不可能再继续支持马科斯政权，里根政府向反对派运动伸出了橄榄枝。

2月25日平行政府成立，阿基诺夫人宣誓就职临时执政。当天夜里，美国军用直升机把马科斯和他的30多名家人护送到最近的美军空军基地。马科斯一家从那里登机，流亡夏威夷。阿基诺夫人正式就任总统。人民力量运动终于成功推翻了马科斯独裁政权。

## 菲律宾：国际因素

没有国家因为马科斯的行爲对菲律宾进行制裁。但阿基诺遇刺后，美国国务院立即向马科斯施压，要求他进行改革。马科斯之所以同意放弃权力，是因为美国政府明确表示不再给他提供军事物资和经济援助以维护其地位。这种制裁——即使不会被联合国或者其它国际共同体列入正式制裁种类——才是外国政府对非暴力运动最有效的支持。

## 菲律宾：国内因素

新人民军游击队在推翻马科斯政权的行动中，最大的失败是没有争取政府军和警察系统投降。在不能担保自身安全的情况下，军人和警察很难同情新人民军游击队和菲律宾共产党这样的暴力运动。因此，马科斯能够成功地指挥军队镇压这些运动，同时也对周围的民众造成了极大地人权侵犯。

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却得到了军人的支持。对现状感到不满的军官和士兵在胡安·彭斯·艾力尔将军的率领下，准备发动政变把马科斯赶下台。当局发现了这一计划，这些密谋的军官和士兵被处决，两个准备发动政变的军营附近被设置了路障。但随后拉莫斯将军也加入了艾力尔将军的队伍，宣布自己不再忠于马科斯，转而支持阿基诺。军队的变节成为菲律宾革命最重要的转折点。大主教詹姆·辛号召教徒支持变节的军队。数以万计的民主运动支持者聚集在设置了路障的军营周围，赤手空拳的修女、牧师和民众组成了一道血肉长城，阻挡坦克，保护变节的军人。在国际电视媒体的直播中，政府军全面撤退，全国范围的军队纷纷起义。马科斯政权再也不能依靠军事力量耀武扬威，美国和其它国际组织也不再对其维持经济和军事上的支持，马科斯政权就此终结。

尽管暴力的共产党组织在教会也有不少支持者（明显集中在低层牧师群体），而且和一些政治反对党组成了临时同盟。但是由于共产党坚持武装斗争、党化管理和抵制选举，最终这些盟友与它分道扬镳。

马科斯对于非暴力抵抗组织的镇压也带来了反效果，阿基诺被暗杀使他成为反对马科斯运动的殉道英雄。200万来自不同地区、不同阶层的菲律宾人聚到一起参加他的葬礼。在马科斯政权《戒严令》期间，曾与他合作的天主教高层（当然也有一些教会自始至终公开反对马科斯的统治）也开始谴责马科斯对人权的粗暴践踏。玛卡提市的商界每周到马尼拉的商业区组织反马科斯游行示威。

起初，受非暴力抵抗运动影响的各个社会组织自发地挑战马科斯对权力的控制。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后来演变成“街头议会”，“街头议会”与非合作是非暴力运动力量增长阶段使用最多的战术。到1984年，工人罢工使整个城市，特别是交通系统停顿，农民也走上城市街头参与静坐，教会让所有反对党（除共产党以外）和商人团结在一起。更加激进的教会和草根

团体在郊县组织了泛基督教大联合，强化以宗教为纽带的动员效果，压缩了新人民军游击队游击队的招募空间。

像东帝汶案例一样，政府对非暴力运动的镇压通过媒体报道引发了人民更大规模的反抗，军队变节，以及国际社会对当局施加压力，迫使马科斯政权最终妥协，非暴力运动取得了胜利。

## 缅甸，1988-1990

1962年缅甸军人发起了一场政变，从此缅甸从一个民主国家变成了世界上最黑暗独裁的政权之一。1988年，缅甸反对派团体组织大规模抗议，向军事独裁政权发起了史无前例的挑战。一开始只是一群学生自发地抗议警察在仰光使用暴力，很快演变成一场重建民主国家的运动。尽管政府承诺会做出让步，比如1990年实行多党选举，该选举最后由反对党国家民主联盟胜出，但是缅甸并没有摆脱高压的军事独裁政权。因此，我们认为这是一场失败的运动。

缅甸从英属殖民地统治下独立后开始的民主进程，1962年在奈温将军的军事政变后结束，从此军政府掌握了缅甸的政治和经济。随后腐败和经济崩溃在缅甸像病毒一样蔓延，零星的抵抗如同蚂蚁被强大的暴力机器捏死。1988年，一个缅甸学生警察粗暴地打死，学生领导的大规模民主运动在仰光爆发。数百名学生被杀，数千名被捕，学校被关闭。学生们再次走上街头要求重开学校，严惩屠杀学生的肇事者。学生和警察的冲突导致更多人死亡和政府对于公共集会更多的限制。

这一事件之后，奈温将军宣布自己不再担任总统和缅甸社会主义党主席。缅甸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仰光大屠杀的屠夫做了新的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对此，反对派于1988年8月8日举行了全国罢工和大规模抗议。数十万不同肤色、不同种族、不同阶层的人们参与了这场运动，他们呼吁终结军政府，组建临时政府，准备多党选举。

缅甸政府用暴力回答了这场抗议，仅仰光就有数百人死亡。类似的血腥事件在缅甸其它地方也在上演，3天时间里有1000多人遇害。在这场运动中，僧侣们加入了游行的队伍，他们甚至在一些地方取得了城镇和村庄的统治权。

1990年缅甸举行了多党大选，反对派国家民主联盟赢得了80%的选票。军政府领导的国家法律和秩序维持委员会拒绝承认选举结果，年轻的国家民主联盟活动份子纷纷被捕、被杀，一些国家民主联盟的领导人被迫流亡。国家民主联盟领袖昂山素季从此被软禁在家。同时，由少数民族武装游击队占领的一些地区也被缅甸军队征服。

反对派的士气遭到重大打击，对政府的镇压束手无措，没有任何准备发起不合作运动做为还击。军政府的部队也异常忠诚，除了几百名空军在1988年短暂变节以外，几乎没有人投诚。国家法律和秩序维持委员会更名为国家和平与发展委员会后仍然大权在握。

## 缅甸：国际因素



缅甸的民主运动引起了国际社会地广泛关注。昂山素季在 1991 年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尽管美国对缅甸军政府进行了制裁，但这一制裁没能对非暴力运动产生明显的影响。实际上，美国的制裁开始之后，缅甸军政府转向中国和印度进口同类商品，美国的制裁的效果被大大的削弱。我们的研究认为，对于缅甸军政府的国际制裁没能增加他们镇压非暴力运动的政治成本。

## 缅甸：国内因素

1988 年以前缅甸的民主运动没有充分地提高统治当局对其镇压的内在成本，没有成功地让公众相信反对派可以替代军政府，也没能有效地促使足够多的军队和警察系统的忠诚度发生动摇（官僚阶层也是如此）。而统治当局却成功地将佛教团体和世俗力量分开，阻止他们成立统一的联合阵线。一些暴力的少数民族起义军队从变节中受益，例如 2005 年著名的西塞义（一个掸邦军司令）变节事件。但是，即使如此重大的变节事件也没有给暴力起义带来明显成果，他们对缅甸军政府展开的军事行动往往是无效的。

起初，反缅甸政府的非暴力动员是大规模的，但是由于反对派各派系争斗造成无法调和的矛盾，使非暴力反对运动一致处于无序状态。而暴力运动在缅甸也是失败的，因为他们完全不能动员人民，只有小股游击队在分散的少数民族边界地区有少量的支持者。

1988 年 8 月 8 日大屠杀之后的一个月里，政府解除了《戒严令》，释放了一部分政治犯，从城市撤出了军队。这次民主运动得益于民众的广泛参与：超过 100 万人在仰光和其它城市抗议示威，其中有些是军人；数千人退出缅甸社会主义党；学生、僧侣、工人组织总罢工委员会和市民议会，成立平行政府，在数十座城市执行日常事务。执政党和议会开始多党选举。在民主运动即将显示出成果的时候，反对派领导人却因为新政府的领导权问题而争吵不休。就在反对派领导人内讧的时候，缅甸军队发起了另一场政变。

1988 年 9 月 18 日，政府重新成立了法律与秩序维持委员会。该委员会重启《戒严令》，禁止 5 人以上聚会。赤手空拳的抗议人群在街头被射杀，数千人被捕或者“消失”。法律与秩序维持委员会进行暴力镇压的同时，反对派示威人群开始撤退，大罢工停止，报道践踏人权案件的媒体被清理，数千名学生逃到边疆少数民族武装抵抗控制区，想组建一支反对独裁的军事武装。

一部分反对派领袖走到一起成立了国家民主联盟，并注册为政党。国家民主联盟秘书长昂山素季周游全国，呼吁多党民主制，废除控制公共集会法案，倡导国家联合和非暴力纪律。但 1989 年中期，国家法律与秩序维持委员会开始对昂山素季和国家民主联盟领导层实施恐吓，拒绝承认昂山素季 1990 年在大选中取得的胜利，并将其软禁在家，成功地抑制了非暴力抵抗运动的发展。

## 案例分析总结：对一场运动成败的解释

通过分析上面 3 个案例，揭示了很多影响非暴力运动成果的因素。

第一，暴力运动都没能大幅度提升当局镇压的政治成本。尽管一些人对暴力起义者产生同情，但从这 3 个案例来看，没有国家因为这些人的活动而发起国际制裁或者物资援助。虽然非暴力运动也没能从外国援助或者制裁中直接受益，但我们的研究表明，对施压时机的把握和外国政府对统治当局支持的撤销，改变了东帝汶和菲律宾民主运动的进程。

第二，没能导致军队、警察系统和官僚阶层忠诚变化的运动很难取得成功。我们的研究表明，在面对统治当局的残酷镇压时，非暴力运动比暴力运动更容易取得成功。其原因很可能是暴力镇压更容易适得其反。同时我们的大数据研究显示，尽管军队、警察系统的变节对于非暴力运动至关重要，但他们忠诚度的变动不一定会在非暴力运动期间发生。在我们的案例分析中，缅甸的军队、警察系统没有明显的忠诚变动。这个失败的案例表明，我们的大数据研究忽略了一些重要的变量，其中包括：大规模动员民众，运动去中心化程度和媒体战略。

相对于暴力运动，大规模动员民众更容易在非暴力运动中出现。因为暴力运动往往要求参与者年轻精悍。事实证明，在东帝汶和菲律宾的案例中，统治当局对非暴力运动的镇压，反而引发了民众的大规模动员，让统治当局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而在缅甸，不论暴力运动还是非暴力运动都没能使当局镇压的成本增加到足以威胁其统治的程度。尽管国际社会对缅甸进行了制裁，但制裁没有达到预期的结果。

大规模动员的对象是广泛还是有局限性，在很大程度上依赖领袖的能力和作风。这些结果说明我们的大数据研究需要做出重大的补充：比如大规模民众动员的本性、等级的变量及其内涵，

能否大规模动员民众对一场运动是否成功至关重要。一个广泛的，去中心化的、分散动员的运动组织面对镇压有强劲的恢复能力，媒体频繁的报道和匿名的领导者，这些特征在提高统治当局政治成本方面都是卓有成效的。

我们还发现媒体战略对于引起公众对统治当局镇压的反应也至关重要。对此，其他学者也有阐述。

## 结论和推测

我们研究的主体部分是非暴力运动是否比暴力运动更容易达成战略目标。我们比较了从 1900 年到 2006 年的 323 个非暴力运动和暴力运动。我们使用大数据分析结果研究了非暴力运动在东南亚的案例。

基于我们的数据和定性研究，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能够使军队、警察系统转变忠诚的抵抗运动更容易成功。这种成功在暴力运动中只是偶尔出现，但在非暴力运动中却经常出现。不过，我们的定量研究受到数据的限制。前面 3 个案例分析显示，暴力运动都没能有效地促使统治当局的精英投奔自己，但相应的情况却出现在东帝汶和菲律宾的非暴力运动中。另外，东帝汶和菲律宾政府对非暴力运动的镇压受到了国际社会及时实施的制裁，这证明了对非暴力运动镇压的政治成本要远高于对暴力运动镇压的政

治成本。

我们的研究还表明，如果一场运动不能兼收并包、去中心化和广泛传播，很难引发大规模投诚和国际制裁。而且基础广泛的运动更让人们怀疑其对手的合法性。政府很容易把一小撮活动家称作“极端分子”，镇压一二十个活动家的政治成本要远远低于镇压成百上千个代表所有人的活动家。

在未来，我们需要更多的分析大规模民众动员的等级和内涵。比如如何在地理覆盖面积，部门齐全程度或者人口构成比例等方面确定一个抵抗运动的广泛参与程度。非暴力运动大联盟的紧密程度是另一个需要实证评估来衡量的非暴力抵抗运动成功与否的内在要素。一个运动使用了多少非暴力战术很容易统计，但是决定一场非暴力运动是否成功，是战术使用得多更有效，还是考虑这些战术使用的先后顺序更有效，值得进一步探索。

我们的研究还可以为抵抗运动推荐几条政策建议。第一，虽然一场运动的成功没有现成的蓝图，但符合大规模动员民众，运动去中心化程度和好的媒体战略这几个特征的非暴力运动比相同条件下的暴力运动更容易取得胜利。第二，在东帝汶和菲律宾的案例中，对非暴力运动的外部支持指向明确是国际制裁起作用的原因。例如美国停止对印尼的军事援助，对菲律宾的马科斯施压。虽然没有证据表明，大规模的民众动员可以通过外援开始或者持续下去，但是争取国际组织的支持是有效的，因为国际组织可以向那些给统治当局提供援助的外国政府施压。不过，外援有时候也会起反作用，因为运动的领导者有可能被指责为里通外国，从而损害领导者的公信力。第三，媒体在引起公众对政府镇压的反感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如果外国政府和非政府组织为独立媒体的创造力和持久力提供资金和技术支持，将会为非暴力运动的活动家与外界交流提供便利。第四，选举监督方面的技术能力建设和人权记录是另一个非暴力运动活动家的有力工具。第五，提供过去非暴力运动经验教训的教育材料（书籍、电影、DVD、电子游戏）。使用这些材料的活动家可以更容易发动群众。第六，把重心放在不民主国家使用网络控制，制定限制国内国际 NGO 发展的法律，和老套的、直接针对公民社会进行威胁和恐吓的证据收集，会给那些致力于通过非暴力手段实现政治变革的活动家带来额外的风险。

最后，让我们一起回顾获得 2005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美国学者托马斯·谢林关于暴力和非暴力冲突的论述：“独裁者和人民以某种方式处在对称位置。人民可以不让独裁者得到大多数他想要的东西——人民可以做到，只要他们能够建立有纪律的组织拒绝与独裁者合作。相反，独裁者也可以不让人民得到他们想要的任何东西——独裁者可以指挥他的军队强迫人民这样做……人民可以不让独裁者享受统治一个有秩序的国家的快感，而独裁者也可以阻止人民当家作主……不论哪一方都面临一个讨价还价的情形。只要有适度的纪律和组织，任何一方都可以阻止对方得到想要的东西。因此，谁胜谁负犹未可知。